

许小青◎著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

from Southeast University to Central University
1919-1937

政局与学府

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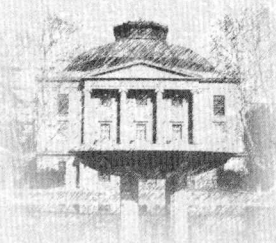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许小青◎著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
from Southeast University to Central University
1919-1937

政局与学府

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
许小青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04-8156-0

I. ①政… II. ①许… III. ①东南大学—校史—研究—
1919~1937 IV. ①G649.28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836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金 泓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306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大学啊,大学!

我一生与大学相伴，即令是浪迹海外多年，依然到处以大学为家。在我的心目中，一座座大学都是有生命的，有人格的，有个性的，各有自己的人生道路，各有自己的历史沧桑。或许也可以说，每一座大学都是一本厚重的大书，永远都难以读懂，读通。

作为绵亘千古的大学流水筵席上的迟到宾客，中国大学生不逢辰，时运不济，堪称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历经坎坷，步履维艰。但是，它毕竟是富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顺乎潮流，适应社会发展与救亡图强的需要，因而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也曾有过自己的兴盛与辉煌，而且还满怀对于更为美好明天的憧憬与期望。

我曾经两次亲历过中国大学遭遇的大劫难，一次是日本侵华战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土大片沦陷，绝大部分大学校舍被霸占甚至焚毁、炸毁，许多学校师生被迫流亡千里，辗转西迁。“文革”十年动乱以后，直至1984年我接任一所大学校长，放眼校园依然有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之感。但是，使我感受更深的，却是大学生生命力的旺盛与顽强，只要是稍具规模并略有特色的大学，一般都有相当坚韧的灾

难承受能力，大多能够像凤凰涅槃一样浴火重生，并且孕育着新的发展。

抗战期间的大学西迁，看来是被动的撤退，但似乎又可以看作是积极的西进，即文化教育资源由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的大幅度转移，其短期效应是文化版图的变易，而其长期效应则是对于西部腹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富有成效的深层促进。经过史无前例的抗战磨炼的大学，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里所焕发的大学精神，至今仍然为时人所神往，是教育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尽管给大学造成的是另一种严重破坏，其后果亦堪称为创深痛巨。而经过此番劫难的大学在“文革”后又复重整家园与百废俱兴，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如同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还来不及抚平自身的伤痛，便雄心勃勃地踏上改革开放的征程。大学在解放思想、革故鼎新方面走在社会的前列，无愧为时代的骄子与文化的先锋，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大学精神。这或许正是许多人至今还保留着上个世纪 80 年代美好回忆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可以看出大学在人间绝对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无时无刻不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大学的历史，既要研究大学的内部结构，也要研究大学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研究大学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许小青博士研究中国大学史多年，深知其中奥略，这本《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是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他刻意将这所大学视为一个处于特定社会结构之中的组织而置于国家、政党与社会之中，考察在政治变迁过程中，东南大学如何从一所地方性大学演变成首都最高学府，以此揭示这所大学与国家、政党、社会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由校长、教师、学生组成的大学是一个小社会，那

么它所厕身的大社会更是包罗万象，不过对学校运作关系更为直接的毕竟是政府（国家）、政党与相关社会群体。从1919年到1937年，正好是从五四运动，经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并迁都南京，于是有所谓经济、文教的“黄金十年”，直至七七事变、淞沪之战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十几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变幻莫测。政治重心的南移，是东南地区经济、文化优势扩大的结果；而政治生态版图的变化，又必将引发文化生态版图的相应变化。这就是从东南大学（地方大学）演变成为中央大学（首都大学）的大背景与大视野。

但是，作者并没有预设结论或单纯作理论推演，他的着力之处，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主要是依托于“人”、“事”两大要素，通过具体历史情境，力求客观地陈述来龙去脉，让史事自身的情况来形成结论。在作者的笔下，书中出现的重要人物，大多都是有个性，有特点，非脸谱化的。几位校长，如郭秉文、张乃燕、朱家骅、罗家伦，都有各自的政治背景、教育理念，乃至个人的性格、作风，不会让读者有雷同之感。特别是学校以外而对学校有重要关联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黄炎培等，也能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不仅廓清其不同社会背景、教育理念，而且还能显现其不同处世风格与因应方略。有些篇章简直可以看作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界的风情画。

作为中央大学前身的东南大学，以东南地区社会精英为凭籍，郭秉文校长历来秉持的自由主义办学理念尚能保持若干贯彻的空间，因而能够发展成为与北京大学抗衡的地方强校，随着首都的南移，政府与政党对学校的渗透和控制日益增强。中央大学取代北京大学成为首都最高学府，虽然在办学资源上可以获得优渥待遇，然而与东南地区社会的固有联系却因此而逐渐有所疏离，大学的独立自主相应缩减了必要的空间。1943年蒋介石亲

自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在对全校师生训词中再次重申：“中央大学顾名思义，应自勉为全国大学之模范，始不负其所处地位之重要。”其党化与国家主义教育理念可谓达到极致，而且也可以看作当时整个高等教育异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也正因为如此，学校与国家、社会、政党之间便存在着连绵不绝的角力。大学本来就是作为旧社会的对立物而产生于中世纪，中国大学更是作为革故鼎新的弄潮儿而出现于神州大地。大学催生了共和，共和却愚弄了大学。在徒有其表的民国政府统治下，大学与国家、社会、政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无可避免的。五四运动正是这些矛盾与冲突的集中爆发，而北京大学则俨然成为引领历史潮流的旗舰。1988年夏天，我应邀参加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百年校庆，日夫科夫总统在大会演讲中热情洋溢地赞誉“索菲亚大学是保加利亚自由思想的摇篮”。当时我就想到，北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又何尝不是如此。过去人们只知道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也未尝不可以咏叹：“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1919年5月4日揭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乃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伟大里程碑。

1928年以后，中央大学因缘时会取代了北京大学的首都大学位置，然而却始终难以成为引领全国精神潮流的火车头。我丝毫无意扬北大而抑中大，因为其所以如此，更多的原因是来自办学环境的明显差异。1928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因为多半由军人集团主导，长于武战而拙于文治，加以内部纷争你来我往，客观上为大学留下较为宽松的办学环境，至少是对于校园以内的事务直接干预很少，而对舆论传媒的控制也不怎么得心应手，这些因素为蔡元培们倡导的大学精神的张扬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迁都南京以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却比北洋军阀精明得多，他们不仅懂得“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而且还千方百计加强党化教

育，首先是极力安排政党势力进入校园，直接干预教学与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首都大学的中央大学反而比远离首都的其他地方大学遭受国家与政党更多的束缚与干扰，很难宏扬自主办学与自由思想的固有大学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在北大反而有所萧规曹随，逐渐形成传统。抗战以后，北大与清华、南开联合办学，精英云集，贤良荟萃，在远离重庆的昆明高举民主、自由旗帜，成为全国广大进步师生自己的精神堡垒。当时，内迁大学比较著名的集结地有三处，即中央大学所在的重庆沙坪坝，教会大学聚集的成都华西坝，与西南联大的战时校址昆明。相较之下，就思想活跃程度排序，应该是昆明→华西坝→沙坪坝。抗战胜利以后，内迁大学纷纷复员回归故地，由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与国民经济崩溃，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形成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北大和清华、燕京等校又复成为引导潮流的火车头，其影响远远超过困处首都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

小青着重研究的是大学文化版图的变异，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学校与国家、社会、政党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我最近却一直在追寻逝去的大学的历史踪迹，特别是追寻那些曾经辉煌但疏离已远的大学精神。也许有所偏离主题，但是并非南辕北辙，其间自有内在联系，或可促进作者与读者作更深一层的思考。是耶？非耶？姑妄言之，即以为序。

章开沅

己丑暮春于实斋

目 录

序言:大学啊,大学!	章开沅(1)
------------------	--------

导论	(1)
----------	-----

一 关于选题	(2)
--------------	-----

二 学术史的检讨	(5)
----------------	-----

三 问题意识及基本思路	(16)
-------------------	------

第一章 东南大学“国立化”与地方社会、政党

(1919—1927)	(21)
-------------------	------

一 “五四”与东南大学的国立化	(22)
-----------------------	------

二 依托地方:东南大学的办学模式	(44)
------------------------	------

三 《学衡》与东南校风	(57)
-------------------	------

四 易长风潮中的政党与社会	(74)
---------------------	------

第二章 “首都最高学府”的名与实:以大学区试验

为中心(1927—1929)	(101)
----------------------	-------

一 从“东南”到“中央”	(102)
--------------------	-------

二 经费与人事:大学区试验的冲突	(133)
------------------------	-------

三 维护学校经费运动	(146)
------------------	-------

第三章 “党化”中的派系冲突：以张乃燕去职

为中心(1927—1930)…………… (160)

- 一 “党化”教育的登台…………… (160)
- 二 挑战与应对：张乃燕的信任危机 …… (174)
- 三 派系与政治风波…………… (193)

第四章 困厄中的校长人选难题(1930—1932)…………… (209)

- 一 朱家骅治校…………… (209)
- 二 迎拒校长风波…………… (236)
- 三 解散与整顿…………… (248)

第五章 罗家伦与“中央化”的初步完成(1932—1937)…………… (261)

- 一 创立民族有机文化：罗家伦的办学理念 …… (261)
- 二 罗家伦初期的安定之道…………… (274)
- 三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平衡…………… (283)
- 四 教授群体参与社会的不同方式…………… (296)

结语 动荡中的平衡：政局、政党与近代国立大学…………… (328)

- 一 中央与地方之间…………… (329)
- 二 党派政治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 …… (334)
- 三 角色、派系斗争与校长人选 …… (341)
- 四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学术文化…………… (346)

参考文献…………… (353)

后记…………… (366)

导 论

近代中国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各种因素和矛盾在这里汇集、融合。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政党政治的勃兴与近代大学的创立均是这场变革的产物。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其制度是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诞生迄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①。与西方近代大学源头上有中世纪一段自治与协会性质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大学一开始就作为国家建制的一部分，直接参与到国家建设之中，并且诞生的机缘和与国家关系的远近不同。中国近代大学先后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如国立、省立、民办大学等，它们的层次不同，使命各异，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其中，国立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最为紧密，参与民族国家建设的程度和深度

^① [加拿大] 许美德：《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均将中国近代大学的起源定为 1895 年。[美]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则将中国教会大学的起源界定为 1850 年。当然还有许多大学史的著作，尤其是高等教育史的著作将中国大学定义为四千年的历史，如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为此陈平原教授专门撰文《中国大学百年？》来进行辨析，收入氏著《中国大学十讲》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金耀基先生也认为中国的近代大学是“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见其《大学之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牛津版序”第 2 页。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历史不过百年，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相对也高得多。近代中国政局动荡,对于国立大学的命运影响深巨,因此,从政治与学术的角度,选取国立大学来探讨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也许更能说明现代大学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难题,诸如中央与地方、学术与政治、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等。

一 关于选题

本书的研究主体——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就是“国立”类型的现代大学。为何要选取这样一所大学作为本书的研究主题?美国华裔学者任以都教授曾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8章《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中考察了中国现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之后,提出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的成立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紧密关系。她认为,“要全面地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展应能提供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①然而,这一颇有见地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多少研究者的积极回应,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著完整地从事国家与大学的角度来研究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这一段历史。就整体而言,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的路径依然过于狭小,正如已有学者所批评的:“几乎没有人把亚洲的大学放在它们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予以分析,把它们当做一种制度来分析其内部的运作,就更少了。”^②

① [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

② 约翰·克来默(John Clammer)著,倪伟译:《过渡社会化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后殖民时代新加坡的大学、政治与知识的制度动力学》,收入贺照田主编《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对东南^①社会而言，经历了从地方军阀政治到政党政治的巨大变迁，身处其中的东南大学以及后来的中央大学深深卷入。从“东南”到“中央”的进程，与东南社会自治力量的式微，尤其与国民党势力的崛起和执掌中央政权密不可分。其中不仅牵涉国民党与东南地方军阀（主要指齐燮元）之间的势力消长、东南社会自治团体（以江苏教育会和上海商会为中心）与政党势力之间的较量，更与南京成为中华民国政府首都这一重大事件关联密切。藉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二三十年代军阀政治和政党政治对大学的深层影响、大学“国立化”过程的名与实、重建学术中心过程中政治与学术的依托与冲突、国民政府是如何完成对权力中心的文化改造——其中所经历的人事纠葛与经费的制度安排尤其突出，同时也可以观察知识界人士在这一过程中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其学术文化的不同面向。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的转变正是政治变迁的产物，它实际上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试验场。

本书选取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这一转变的历史来探讨政治变迁与学术文化的关系，主要基于这所大学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地位。无论是东南大学，还是中央大学，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学术史上，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东南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二所综合性国立大学，中央大学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首都最高学府”，不论是地域影响、学术声望，还是在国民政府教育上的地位，它都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因此，选取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的转变过程，来探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变迁与现代大学命运的关系，并非只是对于曾生活在这所大学和至

① 一般而言，东南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但在大多数语境中，主要指江苏和浙江两省，尤其是江苏（包括上海在内）。

今仍生活在这所大学的人们才有意义。事实上，它对把握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了解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与文化也提供了一个窗口。

选取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这一转变的进程为个案来研究现代国家、政党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以下几重考虑：其一，从选取一个大学的变迁历史入手，容易把握其中的变化轨迹，尤其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该校经历了一个从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大学（东南大学）到位于首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与国家政治的变迁尤其是政党政治的兴起同步而行，无疑为考察变动社会中国家、政党与大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佳的范例。其二，20 世纪 20 年代东南大学的国立化运动，并不是中央政府的主动行为，而是东南社会精英共同运作的结果，中央政府与大学之间处于一种松散的联系之中，大学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随着校内人事纠葛的牵连和政党政治的卷入，东南大学陷入了一场分裂与混乱之中。北伐胜利后，政治中心移至长江中下游，这所大学的历史随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远离政治中心的学术重镇到成为首都的最高学府，其与政府的关系变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与大学自治之间的张力、学生的政治运动与政府的压制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无疑是考察民国时期政治与学术关系的一个绝好研究视角。其三，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与新的政治中心建设相匹配，努力将东南大学等江苏境地内高校合并改组成“首都最高学府”（在当时的语境下，首都即全国），国家如何帮助其实现“中央化”是深值探讨的问题。其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中国现代大学自治体制改革——大学区的最早和最长实践者（1927—1930），其中的人事、经费等曲折、纠葛和失败，为研究中央大学的学术自治体制，检讨大学在中央与地方所处的位置，都是好

的素材。加之，党化教育对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侵蚀，知识精英如何应对、如何分化，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四，国民政府在处理大学风潮的过程之中，是如何最终完成对这所大学从地方到中央的改造，尤其是 30 年代民族主义的再兴，激进的知识精英的抗议给这所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校长治校与教授治校的冲突也是这十年历史中一个一直存在的矛盾，引发了影响很大的风潮。无论是从资料整理情况，还是研究现状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乃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一课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 学术史的检讨

虽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还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对其研究已逾半个世纪，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一批学者从中国高等教育的角度展开对近代大学的初步研究。^① 笔者将目前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近代大学的研究著作，总结为以下四种研究模式：

1. 教育史研究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大学是一个不断将西方大学制度移植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历史。大学制度与政策的不断尝试变革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史突出的特点，从教育史的角度探讨中国

^① 郭秉文：《五十年来之中国高等教育》，收入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下）》1923 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九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931 年版。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抗战前十年之中国》（1927—1936）。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4 年版等，均是按照不同类别对当时高校进行初步统计与归类式的研究。

现代大学的教育政策与制度实施,从宏观层面来把握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大学学制、国家教育政策、学校管理体制等,且不少将视角集中于教育先贤的思想和传记方面,这是目前中国近代大学研究的主要路数。^①由于这一路数太过偏重“典章”方面的研究,往往忽视了政策、制度或措施的落实情况。另外,这一研究取向也容易忽略个体的差异性特征,毕竟中国近代大学是由一个多元化的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

对这一研究路径的反动,是大学个案研究的兴起。这种个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历史相对悠久的大学,台湾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②大陆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兴起一股大学“校史”研究的热潮,几乎所有知名的大学,都组织人员来编写校史和校史研究资料^③。另外,近些年来,有关名校记

① 这方面的代表作如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新版)。台湾学者的专题研究如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0)》,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② 大学的个案研究如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国高等教育研究》(1911—1929)、(1928—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中研院近代史所1988年版。

③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洪永宏:《厦门大学史(1921—1949)》第一卷,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此外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均公开出版了各自的校史。

事性的书籍在市上似乎颇受青睐,^① 这些著作大多文风活泼、形式不拘一格,著者将一件件或宏大的事件、或信手拈来的身边小事作为素材,并以其个人对大学的独特感受、或在大学中的人生体验,向读者展示一个大学所独有的生活场景、情调和精神空间。严格地讲,这些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论文,由于更多是后人的回忆,或多或少掺杂了今人的想象成分,其真实性还有待验证。这些校史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研究者往往站在某一具体大学的立场上,追根溯源,关注大学的成长历程,从学校沿革的角度,对大学的制度沿革、院系设置、人事变迁等进行详细描述,由于相对宏观的政策史、制度史和措施史的研究更为细致,所以更能表现出一所大学发展的具体境况。但这种研究多是平面化的叙述,虽然有时也将政治和社会作为时代背景加以交代,但缺乏深度分析。加之叙述者追求大学的“光荣历程”,对于某些材料的处理有明显的人为取舍,对事件的叙述明显也存在或隐或彰,这一切均有违学术研究“价值中立”的要求。

总之,这种教育史研究模式目前多属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类研究成果,多偏重于教育界本身,只是就教育谈教育,往往忽略教育同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关系。对于这类教育史的研究,已有学者郑重地指出:“教育史家必须细心把握航向,力图克服一种倾向,即只注重学校,而忽视学校所处的社会,因为学校依附社会,是社会的代表。”^② 近年来,一些教育史专家也

① 如辽海出版社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包括清华、复旦、南大、武大等),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老大学故事丛书》(包括清华、复旦、交大和武大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包括南大、北大、清华、中山等)。

② [美] 欧文·V. 约翰宁迈耶:《教育史的本质、目的和方法》,收入其主编的《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方晓东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3 页。